

深化改革需重视中间环节

十八届三中全会描绘了全面深化改革的蓝图,但一部署九落实,改革的成效,在相当程度上取决于在各个地方和具体领域的实现情况。自上而下贯彻过程中,目前最关键的是中间环节,也就是省市两级地方政府,这个环节的领导干部需要充分发挥积极性和创造性,做好设计工作。

中间环节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进行改革开放以来,中间环节发挥了非常关键的作用。习仲勋在广东探索农副产品价格市场化,万里在安徽支持搞包产到户,都为后来在全国范围推行改革举措积累了宝贵经验。中央充分认识到中间环节的重要性,在宪法中亦有“遵循在中央的统一领导下,充分发挥地方的

主动性、积极性的原则”的规定。

全面深化改革的决定是个大的纲要,目标有远近,内容有轻重,步伐有快慢,权力有收放,创新有重点。更重要的是,对于各地的实际情况,时势的变化因素,决定不可能那么细致考虑。因此,贯彻过程中如何把握各种辩证关系,快速、平衡、稳定地推进本地的改革事业,需要地方领导层能够因地制宜、因时而为。

这在当前的改革进程中尤其难能可贵。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所面临的主要问题,是如何在保证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同时,有效化解长期积累甚至激化的社会矛盾。如果鲁莽推行某种全国性的一揽子方案,可能会适得其反;若只靠基层性或边缘性的

微改革,又会产生隔靴搔痒的感觉。

这时候,以一定规模的行政区域为单位,在贯彻全面深化改革决定的前提下,相对自主地进行系统性和突破性改革,是比较稳妥的选择。因此,各地在落实全面深化改革的过程中,需要将“顶层设计”很好地转化为中间环节的推进。

在推进过程中,要做好三方面的事情:其一,根据中央全面深化改革的决定,明确中间环节的改革空间,以避免路线性错误;研究中央制定的各种政策界限,以避免政策性错误;与中央保持密切的互动,以避免误解性错误。其二,中间环节的改革方案需要系统性强、突破性和灵活性结合起来,既要针对该区域的全局性问题设计系统的解

决方案,又要在合适的时机实现改革的重大突破,同时还要考虑到方案的灵活性,以便在困难和障碍中进行有效调整。其三,中间环节不能闭门造车,需要在总结基层实践经验的基础上设计方案,同时通过扩大民主的方式来完善方案,需要在与基层的良好沟通中予以实施,对反馈的问题及时回应。

中间环节的改革能否取得成功,依赖于治理者的政治素质和领导能力。很多地方领导都有干一番事业的雄心壮志,却因为不清楚创造性空间有多大而顾虑重重。随着全面深化改革的深入,中间环节的作用会越来越重要,地方领导应该拿出更大的决心,发挥更多自主性,冲破思维定势,为全面深化改革注入强劲动力。 储建国

谋事贵在务实

近日,习总书记在全国“两会”代表团审议时,强调各级领导干部都要树立和发扬“三严三实”的作风,在领导干部中引起广泛而强烈的反响。其中,“三实”中的“谋事要实”,直指为政的根本,切中了谋事的要害,是谋事的守则,履职的保障,须时刻铭记、自觉践行。

谋事要实,思想是前提。思想是“谋事之基,成事之道”,好的思路决定于事业成败,领导干部的一切行动必须按照“忠诚于党”的总要求,细致谋划、严谨行事、扎实推进、稳步运行。我党一贯主张“实事求是”,任何一项方针政策,任何一项工作部署,都有一个指导思想问题。各项工作必须遵循实事求是,深入结合实际,不能“纸上谈兵”。

务实,是共产党人的本色,也是领导干部的应有品格。对工作来说,来不得半点虚假,如果不从全局出发谋划工作,势必会为明天的事业付出代价,造成不必要的损失。

谋事要实,实干是根本。正所谓“工作靠抓,事业靠干”,真干而不是假干,实干而不是虚干。这既是保持党的先进性的基本内容,也是衡量一个领导干部是否让人民满意的试金石。在这个意义上说,是不是实干,是态度、思想、事业心问题;能不能干,是能力、水平、方式方法问题。大凡成就一番事业的领导干部,都是干出来的,而不是跑出来的。跑出来的干部,群众信不过,工作拿不起,将来走不远;干出来的干部,人民信得过,自己立得起,一路走得稳。

谋事要实,真干是诀窍。“天下大事必作于细,古今事业须成于实。”于己真,才能于人真,于群众真;于己实,才能于人实,于群众实。《语论》里说:“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尤其是领导干部,理应以真心实意对待群众,以真心换真心,用实际凝聚人心,提高士气,真正把工作的高标准立起来,敢于担当责任,敢于直面矛盾,不断

创造出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绩。

谋事要实,政绩观不能错位。错误的政绩观占据了头脑,追求政绩只是为了给己留名,替己立碑,为己邀官,在“实”上必然心浮气躁、好大喜功,热衷于搞“政绩工程”,做表面文章,甚至为快出政绩不惜注入水分,弄虚作假。相反,心里装着为民的理念,以“群众满意”为政绩,以此匡正自己的施政行为,势必会深入实际,深入基层,忙于人民的安危冷暖,自然不会染上私心杂念。坚持以社会建设、维护基层群众利益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多谋善土筑基的长效工程,摒弃竭泽而渔的短期行为;常思雪中送炭的暖心工程,摒弃锦上添花的应景行为;善于育才树人的长远建设,摒弃拔苗助人的急功近利行为。

谋事要实,主观与客观不能脱离。《汉书·河间献王传》中载有“务得事实,每求真是”也。世上任何事物都是形式与内容的矛盾统一体。正确认识客观事物,把主观和客观、认识和实践、形式与内容统一起来,防止在思想认识上陷入主观主义的误区。作为事物规律的“是”,隐藏在“事实”的内部,是从“事实”抽象出来的。因此,在“求”的过程中不能有半点随意性,我们生活的大千世界,无时无刻不处于发展变化之中。拿着此时此地之“是”去套彼时彼地之事,当然会闹出牛头不对马嘴的笑话来。所以,领导干部要不断探索,不断开拓,使自己的主观认识符合不断变化的客观实际,使我们的工作永远立于不败之地。

谋事要实,既是一种高尚的人生态度,更是一种严谨的道德实践。这是各级领导干部的座右铭,必须作为一种智慧来珍视,一种修养来展示,一种品格来提升,一种官德来修炼,一种精神来弘扬。唯此,才能以突出的政绩造福于民,让群众高兴;以过硬的作风取信于民,让群众放心。 吴建国

消除职业教育偏见 比高考双轨更难

近日,教育部副部长鲁昕在中国发展高层论坛上表示,我国即将出台方案,实现两类人才、两种模式高考,将技能型人才的高考和学术型人才的高考分开。(3月23日《新京报》)

高考双轨在国外并不新鲜,德国学生在中学毕业后只有26%的人选择上大学,而超过58%的学生选择上职业或专科学校。这源于德国有一整套制度作为保障,并且市场供需关系产生了支配作用。

据有关资料显示,在中国仅数控机床操作工的短缺量就高达60万人,有的企业为一些高级技工岗位开出年薪几十万的高价,就是招不到人,最后不得不聘请国外下岗的高级技工。对此,有人将其归咎于社会的职业偏见,认为是不理性的教育观念所致。这种理由表面上成立,其实却有失偏颇。

职业偏见绝非天然形成,时下职业教育动力不足,根本上在于对制造业的重视程度不够,没有建立一套从教育到就业,从权利保护到薪酬保障的配套体系,最终使得人们对职业教育的参与热情不足。更重要的是,我国经济发展还处在代加工的初级阶段,制造业的创新力不强,房产和金融显然更具吸引力,这不是高考双轨制可以解决的问题。

高考不是职业教育最大的拦路虎,有没有双轨制都不影响考生的选择。现在职业教育近乎于“平民教育”的代名词,几乎没有领导干部、社会名流的孩子上职业院校,就连反复强调职业教育重要的人的孩子也未必愿意去。另外,职业教育还面临诸多挑战,一是教育的选择存在误区,教师缺乏技术实践,自然难以教出一流学生;二是校企合作没有建立紧密联系,学生要么在学校中僵化学习,要么成为企业“不给钱的劳动力”;三是缺乏一流的职业技术院校,也没有专业化和标准化的教材;四是技术人才没有可靠的就业保障和稳定的成长空间,投入与产出严重失衡。

上述原因制约了技术人才的成长空间,也使得企业对技术人才的培养动力不足,校企共建无法实现,于是职业教育长期处在初级水平,这才是时下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如果说高考双轨制只是改变了供给,那么如何激活需求才是改革的关键。因为消除职业教育偏见从来都不是教育问题,更是市场和经济问题。唯有围绕市场需求和经济现实,进行教育层面的改革,并以此配套一系列的措施,高考双轨才会取得预期中的效果。 堂吉伟德

权力不应过多干预艺术

在人民出版社近日推出的《文化热点面对面》一书中,文化部部长蔡武指出:行政权力对艺术的发展不要过多干预,这样才能促使文艺大师的涌现。

如同社会发展有它自身的客观规律一样,艺术的繁荣也有着内在的规律。有些部门的公仆,主观上确实想让当地的艺术步入高速发展的轨道,但是由于不尊重艺术规律,过多地运用行政权力干预了文艺创作,反而限制了艺术的发展。

若文化部门的公仆能够为文艺事业的发展多做实事,为文艺创作营造宽松和谐的社会氛围,那么,艺术繁荣就会顺理成章,文艺大师的涌现也会随之而来。 吴之如 文/画



城市“牛皮癣”考验社会治理能力

一根电线杆上,少则五六张小广告,多则十几张。记者从银川市新宁巷北端走到南端,再沿着新华街走到鼓楼步行街,沿路电线杆、路灯杆、马路道牙子、灯箱等,都有小广告或者小广告被清理后留下的痕迹。(3月21日《人民日报》)

城市野广告或叫“牛皮癣”广告,是人们形容城市里,车站、街道、厕所、小区等公共场合非法张贴或者涂写小广告的现象,是一种无孔不入的“城市病”,只要是显眼的地方无处不在,令大家深恶痛绝。多数情况下,这些广告是违法的,涉及办假证、非法行医等违法经营行为,而且数量大、清除困难,对城市的市容市貌、环境卫生有很大的负面影响,严重影响城市的精神文明建设。

城市“牛皮癣”大致可以分为三类:一是涉嫌违法犯罪信息危害社会的,比如经常看到的“办证刻章”“快速贷款”“代取公积金”“枪支速药”“治疗性病”等,其中虚假、骗术类的信息比较多,这类广告在城中村、小街小巷等各类流动人口比较集中居住和出入的区域张贴;二是涉及老百姓日常生活需求的,比如房屋租赁、电器维修、疏通下水道、家政服务等等,这类信息在与目标消费者能够直接接触的空间特别是老式住宅区域的墙体、楼道张贴,如老式小区,这类小区往往没有物业管理不够严格,给乱张贴、乱涂写留下了生存空间;三是涂鸦。在我国大多数城市,还是以这两种居多。

一谈到城市“牛皮癣”,很多人义愤填膺。之所以用“牛皮癣”代称,也是因为它确实像牛皮癣一样是个“顽症”,反反复复难以根治。但也有不少人,一边谴责这种现象,一边还拨打上面的电话。这种市场需求的存在无疑助长了小广告的日益猖獗和极度泛滥,是“牛皮癣”长期存在的根本原因。加之非法小广告制作成本低,收益高,易逃脱,在经济利益的驱动下,这些人不铤而走险。违法成本低、执法成本高,是城市“牛皮癣”治理面临的两个难题。

随着城市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我们会发现,越来越多的治理难题都是涉及多头管理,也正是因此,多头管理,客观上就增加了治理的难度,使原本的难题“难上加难”。就像城市“牛皮癣”一样,不仅需要城管部门日常监管和创新治理方式,而且需要公安、税务、工商部门联动,着力打击假广告、假证件、假发票等涉嫌犯罪的行为和人员和高点。

城市“牛皮癣”考验着社会的治理能力。从管理到治理,一字之差,却折射内涵之变,体现的是系统治理、依法治理、源头治理、综合治理。城市“牛皮癣”的治理,需要疏堵结合、群防群治、多策并举,对症下药,需要政府、群众和其他社会力量的共同介入、积极参与,才能让这一顽疾,这一看似小事的“大事”得到有效解决,彻底还城市一张干净清爽的面容。 宋华

低价药为何经常“消失”

据《人民日报》报道,湖南长沙一名市民脸上皮肤过敏,到楼下药房买药,药剂师推荐120元一盒的进口药和60多元一盒的国产药,基本药物目录中不到10元一盒的维E不见踪迹。这名市民跑了好几个药房,都没有找到维E。《人民日报》记者在湖南、安徽等地调查发现,低价药“玩消失”的现象并不鲜见,一些用于急救或治疗感冒、老年病、结石、风湿等疾病的低价基本药物经常一药难求。

基本药物目录中的低价药“玩消失”,而这些大多是治疗常见病、多发病的药品,市场需求量大,一旦缺货,患者被迫购买价格高出几倍、十几倍的进口药或国产新药,由此大幅抬高了患者的成本。

低价药为何经常“消失”,从“低价”二字即可找到答案——由于价格低,利润也低,药企仅有微利甚至无利可图,缺乏必要的生产积极性,于是轻易就决定停止生产。以往药企停产低价药后,往往会在药品成分、生产技术基本不变的情况下,换一个名字重新注册新药,新价格比旧药高出一大截,药企从中牟取暴利。后来,国家严把药品监管关,“换名不换药”的把戏再难玩下去。

然而,近年各地屡屡出现的低价药“玩消失”现象,表明我国基本药物制度还存在不少问题,特别是在基本药物生产供应保障体系这一块,存在着比较明显的缺陷。其中最大的短板是,公共财政对基本药物生产供应体系投入不足,保障不力,一些生产企业、经销企业未能获得应有的补偿,难以从生产、经销基本药物中获得合理利润,限制了他们从事国家基本药物生产经销的积极性。一些低价药动辄“玩消失”,既有药企的原因,也有公共财政投入保障不到位的原因。

医改既是“医”改,同时也是“药”改。“医”改的重点是加大公共财政对公立医院和医保体系的投入,推动公立医院更多提供公益性医疗服务。同理,“药”改的重点是加大公共财政对基本药物生产供应体系的投入,保证基本药物生产供应企业的合理利润,保障基本药物特别是低价药的市场供应。

近两年,较之“医”改方面的切实进展,我国“药”改方面进展不大。唯有深入推进“药”改,加快建立国家基本药物制度,改变医改“重医轻药”的失衡局面,才能避免低价药“玩消失”的尴尬。 潘洪其

“奶酪”坚硬怎么动?

有经济学家设计了这样一个实验:手里拿着一枚硬币,在街头随机拦下一个路人,问他愿不愿意参加抛硬币的游戏。如果硬币是正面,他将获得10美元;如果是反面,他将输掉10美元。结果,拒绝参加游戏的路人超过九成。

看来,对普通人来说,可能失去10美元的恐惧感,超过了可能得到10美元的满足感。经济学家把这一现象称为“损失厌恶”。

进一步的实验表明,假如某人意外获得1美元,他增加的满足感为1;那么,让他口袋里已有的钱意外损失1美元,给他带来的心理损失高达2.5。这意味着,面对同样的财富,如果没到手时,人们可能愿意用一分的努力来赚取;而如果这财富已经在自己手中,人们可能愿意用2.5分的努力来保住它。这就是“损失厌恶”带来的效应。

由此,想到了既得利益。李克强总理在今年两会记者会上说:“改革会触动利益,会触动‘奶酪’”;在去年两会记者会上他也说:“现在触动利益往往比触及灵魂还难。”

其实,利益这个词并非贬义词。利益是人们永恒的追求,是生产力发展的内在驱动力,正如亚当·斯密所说:“我们的晚餐并非来自屠宰商、酿酒师和面包师的恩惠,而是来自他们对自身利益的关切。”30多年前,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中国大地上迅速普及,一举摘掉了农村贫困落后的帽子,动力就是一句话:“交够国家的,留够集体的,剩下的全是自己的。”

正当的利益必须受到保护,需要破除的是阻挠改革的既得利益。时下,一些垄断企业在高筑的壁垒上赚取超额利润;一些政府部门满脑子“权力部门化,部门利益化”,有利抢着管,无利躲着走……全面深化改革,要动的就是他们手中的“奶酪”。

由于“损失厌恶”效应的存在,这些既得利益的“奶酪”将格外坚硬,这就需要我们拿出勇气、韧性和智慧。事实上,用“杀出一条血路”的胆魄和“咬定青山不放松”的韧劲打硬仗固然重要,更可嘉许的还是打巧仗。

这就不妨在消减既得利益者“损失厌恶”效应上做文章。比如采取“形成共识”法,通过入情入理的宣传,让既得利益者明白,为了长远的、更好的发展,应当暂时让渡部分利益,否则他们手中的利益将遭受更大的损失。

比如“增量突破”法,由增量改革涉及的是后续发展成果谁得谁少的问题,而不是对已有财富的再分配,这么做可使矛盾和阻力最小化。用增量稀释存量,同时稳妥推进存量利益的优化,经过一段长时间,利益分配就会慢慢走向合理。

“奶酪”坚硬,改革的动力将更为强大。因为:这利益,那利益,都比不上人民的根本利益! 田俊荣

如何破除“部门利益”

各部门行政审批事项的清单,用权力清单的方式向社会承诺权力边界。“法无授权即禁止”,这句法谚在近段时间多次被李克强强调,亦由此可见确立权力运行规范之于改革深入的重要性。

开出权力清单,明确政府能做什么,保留什么,又放开什么,对于政府而言,应当是一个痛苦的割肉过程,而非选择性地丢包袱,这是行政审批制度改革过程中有必要警惕的。权力清单的列开,目前的运作方式基本是靠政府部门自查、自报,自我剔除部门审批事项与职能,而包括人大、民众在内的其他主体对此缺乏话语权。正如李克强所说,审批制度改革要“防止边减边增、明减暗增”,而这一“增”的底气,来自于对改革话语、思路本身的实质性掌控。在审批制度改革的过程中,对“市场机制能否有效调节”的判断权依然在政府部门,使得权力开放事项的选取,缺乏必要的辩论和监督。这或许应是蓝皮书“行政审批

“法无授权即禁止”的权力边界很可能形成同虚设——政府部门通过部门立法将部门利益、权力合法化,事实上就是权力者自己掌握了“把权力关进笼子”的钥匙,甚至是笼子的编织者。

部门利益的影响,体现在国家和社会的秩序方面,则在在于政府部门借由手中权力对司法的影响。三大诉讼法律中,为什么唯独只有行政诉讼呈现出有悖于司法规律的原告败诉率奇低的局面?除了司法机关本身的严重行政化外,部门利益通过部门立法以及权力干预等方式对司法判断的影响,不容小觑。行政体制改革的深化,核心在审批制度的改革,其根本则在规范和限制行政权力,这就必然包括让政府部门权力及其利益,在诸司法裁判时,真正还原为一个平等的普通主体。

让行政权力回归本来位置,不可能是一场轻松的郊游,剥离原本不属于行政权力的部分还给市场,收回和超越通过“部门立法”而已然“合法化”了的部门利益,注定会很坎坷、阻力重重,但却是最得选的一条路,且退无可退。正如李克强所言:“我们要有壮士断腕的决心,言出必行,说到做到,决不明放暗不放,避重就轻,更不能搞变相游戏。” 南文